

提一個大問

陳世敏*

壹、說「意義」

新學科總是要面臨學科認同的問題。學科的誕生，通常有賴於大師一出，典範既定，後繼者百家爭鳴，眾聲喧嘩。所以達爾文「物競天擇」概念一出，生物學大事底定；哥白尼《天體運行論》問世，天文學便脫離拖勒密學說大步發展；馬基維利《君王論》提出，政治學許為核心理論。接下來常常是數十年或數百年的細部演繹，山頭併起，眾聲喧嘩。這是健康的爭鳴。

看看社會學，像「社區」、「文化」之類的基本概念，都曾衍生出一百多個定義，經歷修正、補闕、充實。

後人之所以爭論，正因為大師們提出了社會學的核心問題。喧嘩是對話的一種方式，始於一個大開大闢的提問。

傳播學的「先驅者」杜威、米德、派克都曾提出亙古大問，可惜，傳播學「創建者」沒有承繼傳播學術的思想系譜，便一頭栽進科學主義的鉅釘之學，投注在所謂的行政研究，徒重枝節，忘了根本。

生物學問：生命如何可能？

天文學問：宇宙如何生成？

社會學問：人類如何互動？

*慈濟大學傳播學系教授。E-mail: chensm@nccu.edu.tw

傳播學的行政研究傳統，無可避免地把媒介的運作，視為核心關懷，順理成章的問：媒介有什麼效果？

結果正如所料，傳播學在美國變成了媒介效果的研究。美國的另一傳統詮釋途徑，還沒有來得及在傳播學舞台上發生，便打入冷宮不得翻身。依詮釋取向的思想，傳播學的核心問題應當是：意義是如何形成的？

一個核心概念，必須是犀利的，直指學科的關鍵特性，可經千百年而不易；必須在學術社群的知識建構方面獲有共識，並引起高度重視——也足以引起喧嘩。概念犀利一方面是要創造知識，另一方面是要區隔其他學門。

傳播學如果問「意義是如何形成的？」則傳播的核心概念由媒介轉向 Mediation（介質，中介，中介作用），脈絡就益發重要。加上脈絡，問題轉成：「意義在什麼文化脈絡之下如何形成？」

請看看，經此一問，傳播學的格局是不是大多了？

就社會科學而言，核心概念的提出，顯然不是水到渠成的形式主義所能勝任的。歷史文化脈絡／價值系統這一類 Geertz (1983) 千叮萬囑的「地方性知識」，臨到末了，才是意義形成的關鍵。Geertz 認為，像法律這個領域，是非善惡的標準存在於文化的價值體系之中，是無法拿外來的標準來衡量的。一個文化的價值體系，便是「地方性知識」。

傳播學的知識發展一向未能扣緊核心關懷問題，又沒考慮「地方性知識」。某種意義來說，行政研究必然如此，因為行政研究講究通則。更糟的是，它蒙蔽了學者的想像和研究的視野。像《叫魂》（孔復理，2000）和《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》（史景遷，2000）在現狀下幾乎不可能受到傳播學術的青睞。本文正好借用這兩項坊間新近問世的研究，來為上面的論證作個註腳。

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吳宇敏教授

檢閱《叫魂》的傳播學大問 83

貳、說《叫魂》

慧峰

《叫魂》寫的是乾隆盛世妖術流言的傳播過程、乾隆的對策、文化脈絡。作者利用清宮檔案中的乾隆御批及民間方誌，試圖「重建」滿清王朝政權正統性的危機意識。本書重點如果被解讀成「妖言惑眾」，則不過是在討論一般的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問題；如果重點放在御批及滿漢關係，則不過是另一個歷史學或政治學問題。其他人當然可以做這樣的理解。

但《叫魂》似乎更適合傳播學的討論，因為它問了一個傳播的核心問題：意義如何形成？

乾隆的情境釋意 (Definition of Situation)，把一件單純的民間信仰傳聞，解釋為對政權統治權的蓄意挑戰，居然大張旗鼓，細查嚴辦，欲除之而後快。自己心中有鬼，外界任何風吹草動都被附會攀引，訂上標籤，視為想像的敵人。其結果，由於「自我實現的預言」(Self-fulfilling Prophecy) 作用，稻草人果真成了真正的敵人。

至於文化脈絡（地方性知識），那就顯而易見了。乾隆始終不放心漢人（尤其是江南一帶漢人），不放心明朝遺老，不放心知識分子…。他的心中大患，緊緊扣住外界的風吹草動，每一封新奏摺都帶給他新的思考，新的疑慮。

《叫魂》反映了釋意的轉折與文化脈絡的交相為用，曲曲折折，清楚指出了意義形成的中介過程。

另一個研究《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》，更是直指雍正御批背後的處心積慮。滿清異族統治的危機意識，更早在雍正時代便已沸沸揚揚。夷族、外藩、官僚體制的問題固不需細表，雍正就位得自謀逆的傳聞，更與雍正待人絕對有莫大的關係。曾靜謀反的案子，引發雍正極大的不滿（我對你們仁至義盡，你們居然還要坑我？），最後雍正甚至跳出來親自撰寫《大

義覺迷錄》頒行天下，與其說是為滿清統治正當性辯護，不如說是替他自己登基的合法性辯護。至於雍正皇帝躬親處理「曾靜案」奏摺和詔令，故意迴避一般官僚程序另闢密徑，以及《大義覺迷錄》頒行全國的綿密作業程序，可以說是思想傳播的一個典型案例，在今天民主時代看起來，仍有似曾相似之處。這樣高潮迭起的精彩題材，只因為其中沒有報紙、電視摻一腳，傳播學就不予眷顧，未免可惜。

參、千年大問

孔子說：「天何言哉？」意思是說，山川草木各就其位，四季天象依序運轉，天地何曾講過什麼話？

沒有。

但山川草木和四季天象經過人為處理，變成物理學、天文學、社會學種種不同的學術。學術本同出一源，就看你問什麼問題，就成什麼「學」。傳播學是否成「學」，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研究傳播現象的人必需問出一個千年不悔的大問。如果傳播研究者能夠問出一個犀利的核心問題，傳播要不稱「學」恐怕也難。

蛙鳴、蟬鳴、蚊鳴，都是眾聲喧嘩，徒然以量多聲大取勝而已。說「傳播」無所不在或說「傳播」很重要，恐怕對我們都未免太沈重了些，早晚會逼使傳播的學術發展之路愈走愈窄。我們需要少一點形式主義，多一點理性想像，把建構主義的中心思想放在「地方性知識」之中來詮釋，連什麼「中國化」、「在地化」都一齊免了罷。

想到詮釋學派代表人物杜威的洞見：「我們賴傳播生存，更因傳播而存在。」說實話，我寧可選擇這樣的獨白。

參考書目

- 史景遷 (Spence, Jonathan D.) (2000)。《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》，溫洽湓、吳家恆譯。台北：時報出版。
- 孔復禮 (Kuhn, Philip) (2000)。《叫魂》，陳兼、劉昶譯。台北：時英。
- Geertz, Clifford (1983)。《地方性知識》，王海龍譯。北京：中央編譯社。

